

理性言说与 心魂浮沉：

中国现代散文论集

LIXING YANSHUO YU
XINHUN FUCHEN

马 萌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理性言说与
心魂淳沉：

中国现代散文论集

LIXING YANSHUO YU
XINHUN FUCHEN

马 萌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凯(特邀) 徐燕
责任校对:高庆梅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言说与心魂浮沉:中国现代散文论集 / 马萌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 - 7 - 5614 - 4675 - 1

I. 理… II. 马… III. 散文 - 文学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I207.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171 号

书名 理性言说与心魂浮沉:中国现代散文论集

著者 马萌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 - 7 - 5614 - 4675 - 1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张 5
字数 122 千字
版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现代白话散文的源流与嬗变（代序）

—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散文”，更确切地说，应该析分为两个互有关联，又显存差异的概念：古典散文和现代白话散文（现代散文）。现代白话散文是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散文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而又从外在表现形态和内在文学精神上与之都有着很大差异的一个文学概念，一种文学史的存在。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非是我要刻意地标举现代与传统的悬异，以刻画一个所谓“反传统”的微渺的背影。乃是在于，肇端和发荣于 20 世纪初叶的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精神内涵和表达范式，都是直接滥觞于晚清，滋长和繁盛于 20 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片思想沃土和文化土壤。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其重要的文学史功绩之一，就是导引了新的文学格局的形成。晚清和五四先贤们将在传统中国被鄙视的“小说”和“戏剧（曲）”，通过与域外输入的文学思潮和观念相杂合，提升为新文学的主要文学体裁；将在传统中国处于主流地位但已严重异化的诗歌和散文，通过白话文运动，使其转型为新诗和新的散文形态。自此，中国散文走出了“诗、文/韵、散”区隔对分的时代，从一种笼统的说法、文类前进为在全新的文学格局中与“小说、诗歌、戏剧”鼎足而立的文学体裁。这是现代白话散文所赖以存在的根基和文学合法性的来源。

从传统的古典散文向现代白话散文的转型，不仅仅是语言工具即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作者内在文学精神的彻底变革。这种重大的心灵变革（李泽厚称之为“转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在晚清末年遭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其心态向近代化整体转变的一个缩影。从晚清绵延至五四时代的一股声势日渐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促成了变革在文学领域的实现。（学者陈万雄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指出“晚清确存在一个白话文运动，且直接开五四白话文学的先声”，“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确是一脉相承，不能分割”。他还认为，“辛亥革命这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与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在人脉谱系上都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①北美学者王德威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其实历史从来都不是突兀的，而是所来有目的。所不同的是，陈万雄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清末反传统思想的合理发展，而王德威则将之指斥为晚清文化多样格局悲剧性的反向收束。^②如果说这种变革或曰“转换”在晚清知识分子那里还只是一种“预告”的话（“尽管这批第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③），那么，在五四知识群体那里就已经变成了现实。“他们已不像上一代曾经长期沉浸和捆缚在传统的观念和生活中，他们是在中国空前未有的自由氛围中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尽管有着各种旧的束缚，如主观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礼教观念，客观上贫穷、困苦、腐败的社会现实在压迫、管制、阻挠着他们。然而，新的生命新的心灵对新的人生新的世界的憧憬，却仍

① 陈万雄：《五四新文学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3、164、128页。

② 参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

③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然是这一代思想情感形式和人生观的主要标志。在理论、思想上，五四前后出现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主义’学说、思潮，弥漫一时。在文学上，抒发胸怀而不成系统，倾吐心臆而尚未定形，散文或散文似的新诗便成了此代心魂的最佳的语言寓所。”^①

作为自由主义哲学核心论域的个人主义，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曾经大放光彩。（“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直到那时，我们才发现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不可或缺之哲学内核的人性观与世界观发生了意义重大的深刻变革。这种内核即为个人主义，将人视为个体的存在，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洞见，而正是这种观念构成了文艺复兴的主要特征。”^②）借力于个人主义学说，新生的中国青年们义无反顾、意态昂扬地冲破封建专制的“家”与“国”的牢笼，去寻找无拘无束、自由平等的家园乐土。五四青年的思想领袖陈独秀曾以不容置疑的决绝口吻说出了所谓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三条差异，其中第二条就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同时，他还宣布了宗法制度的四大恶果：

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疑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伐贼个人之生产力。……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③

陈氏立论的着力点，全在“个人”。在那个时代，诸如人生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4~215页。

^②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③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差异》，见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3页。

的唯一目的在于“为我”和“快乐”^①；国家非个人之归宿，“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②；中国的家庭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乃是“万恶之原”^③等等意态纵横的话语，响彻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天宇云端。新文学的先行者们——尤其是散文作家们——更是成了找寻自由、呼唤个性的报春雨燕。郁达夫在20世纪30年代总结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散文创作时认为：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用于我这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④

所以，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都充溢和表现着“个性”，就成了现代散文最大的特征。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个性（个人性）”，是与个体的精神自由和思想独立紧密相关的。

然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个人主义”都是一个备受争议和误解的概念。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弗·冯·哈耶克在发表于1946年的一篇题为《个人主义：真与伪》的演讲中感叹道：

① 李亦民：《人生的唯一目的》，见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3页。

② 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见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3页。

③ 孟真（傅斯年）：《万恶之原》，见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3页。

④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见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精华·散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当今的政治术语极其含混不清，甚至同一个术语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都往往意味着几乎相反的意思，在这个方面，受害最大的政治术语莫过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术语了。它不仅被反对它的人歪曲得面目全非（我们应当始终牢记，一些在今天已经不再时兴的政治概念，只是通过反对这些政治概念的人对它们所作的歪曲的描述才被大多数当代人所知道的），而且还一直被一些论者用来描述若干对社会的看法，但是这些对社会的看法之间却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而且它们之间的区别程度甚至不亚于它们与那些在传统上被视作是其对立观点之间的那种区别程度。的确，我在准备撰写本文的过程中考察了一些有关“个人主义”的标准描述；然而，这项考察工作的结果却使我感到后悔不已，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此之前怎么会把自己所信奉的那些理想与这样一个被如此滥用和如此蒙遭误解的术语联系在一起呢？

在这篇提前发表的“简缩版”的“自由宪章”中，哈耶克试图拂去因误解和歪曲而蒙落在“个人主义”（其实在这里指代的就是“自由主义”）这个词上的灰尘，努力标举更加精确和纯洁、反对唯理论和建构论认识路径的“真个人主义”(true individualism)。

真个人主义的基本主张认为，通过对个人行动之综合影响的探究，我们发现：第一，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第二，套用亚当·弗格森的话来

说，“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它们的制度则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第三，自由人经由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这就是乔赛亚·塔克、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和埃德蒙·柏克所阐发的伟大论题，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作出的一项伟大发现：它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也为理解大多数真正的社会现象奠定了一个基础。^①

或许是哈耶克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不甚显著，在出版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杰出著作《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哈耶克将在《个人主义：真与伪》中表达的思想作了充分而详尽的扩展后，却最终放弃了使用“个人主义”这个概念。

在 20 世纪变异了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中，“个人主义”更是与自私自利等负面价值画上了等号，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禁止。而古典散文最大的遗产“文以载道”，也并没有因作者接种了“个人主义”的思想牛痘而消泯于无形，相反以载集体、国家和家族神话的意识形态之道，在 20 世纪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了时尚的主流。只不过，传统的“道”在这里变成了另外一个带有激进色彩和“革命性”的词汇：思想。作家们纷纷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思想是一切的灵魂。……在我们的作品中，哪怕是一篇文章吧，一定得贯注崇高而健康的思想感情，

^① F. A.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 7、8、12 页。

才能够使它具有生命力”^①。“文学作品应该有思想。散文也不例外……散文家必须是思想家。散文要求有特别锐利的思想，今天的散文更要求有特别锐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②在特殊的文学时代，作家们虽然也不断地强调“个性”、“自我”，却又不得不陷入一个怪诞而夹缠的悖论之中。“文学是通过个性表现共性的。它时常要求作者不回避表现自己。诗和散文，对作者的这种要求更加显著。……其实问题不在于表现‘我’有什么不好，而在于这个‘我’究竟是个人主义的，脱离群众的，低下的，还是集体主义的，和群众共呼吸的，崇高的？”^③一方面强调表现自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将“我”湮没于集体之中，掩藏在时代共名之下，想来令人叹息不已。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二

破除了“国”与“家”的神话桎梏，走出了“文以载道”的文学黑洞，附着在这两者之上的古典散文的重要表现形态“议论”，也就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中被现代散文的根本特性“抒情”所替代，“抒情性”就成了现代散文区别于古典散文另一个最重要的本质特征。这并不是说现代散文就狭隘地等同于抒情散文或所谓“艺术散文”，同时认为“抒情”就是缠缠绵绵、温软甜腻、风花雪月，那也是对抒情的一种过分狭窄的理解和固化的思维。抒情的本质指向，乃是对个人独异于他人心魂所外化的种种情

^① 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3页。

^② 徐迟：《说散文》，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0~21页。

^③ 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4~15页。

绪、感受和体验等的真诚书写，所以，抒情的“情”，恐怕并非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情感”，更多的是“情绪”。^①因此，说抒情散文是现代散文中的主流形态，并左右了人们对现代散文的文学惯例的形成，并不为过。而且这种“抒情性”的因子，在现代散文中是随处可见的。叙事和议论都已不再是现代散文的根本目的，其最终的写作意图在于展现写作者的一些情绪、感受和体验，最终的指向是写作者个人的心魂秘境。

在现代散文的草创阶段，亦即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初期，其表现出的形态是相当的驳杂和混乱：

初期的散文，似乎并没有一个定迹可寻，往往与杂文相混。纯粹的散文议论文居多，余便是说理。不用客观铺叙而直接发挥主观的一种文体，题材多半对政治、社会、经济种种现象的黑暗面加以弹劾或抨击，尽有很多是现在目为杂文范围而在那时候一概视为散文的。抒情的极少。^②

这是丁谛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写的一段文字，如果我们比较细致地翻阅《语丝》等 20 世纪 20 年代的散文报刊，那么得出的结论恐怕和这段话相距不会太远。随着 30 年代杂文的兴盛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传统和范式，以及报告（文学）的崛起，初期现代散文所承担的理论和叙事的重要职能，迅速被杂文和报告（速写）等承接和分担。而“小品文（小品散文）”概念的提出，则使现代散文的抒情性有了合理的承接和凸显。虽然，小品文的概

^① 兴起于 20 世纪末的所谓“新（艺术）散文”的代表作家们的散文实践，更是将“情绪”和“情绪”的不确定、飘忽随意等，通过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文学意象的“支离破碎”，表达到了现代汉语所能达到的尽可能的远处。对这种文学实践在理论和艺术上的阐释，可参阅刘烨园的一篇名为《新艺术散文札记（三则）》的文章。

^② 丁谛：《重振散文》，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 年版，第 157 页。

念在“左翼”和“右翼”文学阵营的论争辩难中显得相当的驳杂和随意，但以个人性和抒情性为本质特性的现代散文的逐渐成形和破茧而出，却成了不可逆转的文学趋势。到了40年代，这种趋势就已经成了既存的文学事实。葛琴在40年代曾经写了一篇相当有价值的文章《略谈散文》，在文中，她给散文下的定义是：

到了新文学在中国发展以后，在文学形式中间，通行着一种抒情的小品文，我们叫它做散文。它的含义和英文中间的 prose 以及韩柳所提倡的散文体，却不完全相同。它大概是抒情诗的内容，而以比它更自由的文体写出来；相类于散文诗（blank verse）而比它更自由和广泛一些。^①

葛琴清楚地意识到了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的差异，并且以抒情性来区分现代散文和报告（速写）、杂文等，这样的论说使现代散文的面目变得清晰和明朗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中，一种类似于新闻作品的所谓“特写”、“通讯”等文体受到了官方理论家和主流作家们的高度重视，从而在20世纪50年代空前迅速地繁盛起来，成为当时散文作品的主体样式。然而，“吊诡的是，在当时大多数散文家——尤其是被称为三大家的杨朔、秦牧、刘白羽——自觉依照或无意暗合这种观念所创作的作品之中，绝大多数却是被人们称之为‘狭义的散文’、‘创造性的散文’（余光中语）的抒情性散文。如杨朔的《香山红叶》、《蓬莱仙境》、《泰山极顶》、《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秦牧的《古战场春晓》、《土地》、《社稷坛抒情》；刘白羽的《日出》、《灯火》、《长江三日》、《樱花漫记》等。这其中有什么样的秘密存在呢？对这样的情景出现可能

^① 葛琴：《略谈散文》，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65页。

的解释是，作家们在公开的理论申述中，出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动迎合或被动接受，需要秉持一种‘海阔天空’式的泛化的散文观。因为在这种观点的遮掩下，作家们可以最大可能地逃避由于自我心魂的剖露而受到批判甚至打击的厄运。而在创作时，隐在的散文是或者说主要是抒情散文的文学惯例便悄然地左右了作家们的写作。于是，在‘十七年’散文的图景中便出现了理论上‘泛化’或‘广义’的散文观与文学实践中‘狭义’的散文作品共存不悖的有意味的一幕。”^①最终，多重的原因促成了抒情散文传统的回归和散文主体样式在 60 年代的挪移。

到了 20 世纪末，“散文和抒情诗都是侧重于抒发主观情感的文学样式”^②，“小说和戏剧是‘向外’的叙事文体……而诗歌和散文却是‘内向’的抒情文体，‘表现’心灵世界（内宇宙），‘倾吐’主观感情”^③等等与之相类的界说，就已经成了学者们的共识。贾平凹认为：“我觉得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我的创作是受活于社会和我自己的活受，而具体到散文，我一向认为是一种你觉得要写的，最无规则最自由最易表现情绪的文体。”^④

在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型的过程中，晚清文学和新文学运动的先贤们逐渐将古典散文提纯和规约为现代散文，使之从一种文类走向了体裁。同时，“个人性”和“抒情性”也逐渐凸现为现代散文最显著的两个特征。这样的历史性转换，应该说是适应了社会的整体形态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符合现代社会中

① 马萌：《形散神不散：理论与实践的错位》，见《科技风·教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② 林非：《散文研究的特点》，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 年版，第 245 页。

③ 刘锡庆：《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 年版，第 360 页。

④ 贾平凹：《贾平凹散文精选》，菡萏、王川编，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3 页。

人们对散文的表达期望和要求，也增强了散文文体的艺术性和吸引力，这是值得我们为之欢欣鼓舞的！

三

以上所说，无非是些尽人皆知的文学史常识的老生常谈。其实，站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之中，我们既要重视现代散文与古典散文的联系，更要充分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或许是为了回避“反传统”的指责和攻击吧，时贤的研究总是乐于发掘两者之间的联系和承继，而我认为，对这种差异的强调和对现代散文独立的文学精神和品格的深入理解，恰恰是我们应该做的。^①站在笼统的“散文”概念之下，有的学者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抒情散文不是中国散文的主流”，并且 20 世纪 90 年代散文的复

^① 正如袁伟时先生指出的那样，反传统与否，不应该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传统”同样是需要分析并区别对待的，传统并不等于美好，尤其是观念形态的传统，更是应该任其自然演进，该生者生，该死者死。传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文学实践，也应该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而受到重视（参阅《编者的话：文学革命与“反传统”的是非非》，《编后絮语》，见《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王富仁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了他的“新国学”的组建方案。学者何怀宏先生也在自己的一篇名为《中国三种“传统”的认识与选择》的博客文章中提出“三种传统”的说法，他认为自五四以来的近一个世纪的文化文学实践是中国的“第二种传统”，即所谓“以百年（century）计的传统或‘百年传统’、‘世纪传统’”。这种传统是“是前期启蒙，后期革命的传统。它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持久的激荡和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与袁伟时和王富仁先生理解的角度恰好相反，何先生则是站在较负面的立场上来理解这种传统的，在他看来，“第二种‘百年传统’实际上是激烈地反传统的‘传统’，它代表着一种决裂，或至少是‘断裂’的传统”（见 www.blog.sina.com.cn/m/hehuaihong，2006 年 3 月 30 日）。

兴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有关系。^①然而，这样的论说恰恰抹杀了现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之间的这种深刻的差异。有的作家倡扬“大散文”，其担心“当前散文路子越走越窄，散文写作境界越来越小，如果仍在坚持散文的艺术抒情性，可能导致散文更加沦为浮华和柔靡”^②，其加以救弊的初衷和良苦用心是相当令人感佩的。然而在呼唤“野莽生动之气”和创作主体的多元化的旗帜之下，却可能会导致散文文体的芜杂和粗糙，消融现代散文的艺术性，取消现代散文赖以存在的理论根基。这倒不是什么“清理门户”和“净化文体”，而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实践的重新梳理和重新述说。对古典散文的迷恋情怀，对现代散文抒情性的有意或无意的拒斥，其实，说起来都是一种时代感的错位。这是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文化实践的视而不见，更是对社会形态的根本转换之后的新的社会心理的漠视，是用理论上的古典形态来阐释和研究实践上的现代作品。虽然现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杂并存的阶段，社会大众从文化心理上远未充分地完成从封建专制下的臣民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的转换，但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的发荣滋长，发现“个人”的流惠所及，使散文这一文体的根本指向从外在转向了内在，从以“道”为中心转向了以“我”为中心，从极力关注外部世界到细心谛听内宇宙的波澜脉动，成了无可更易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一点，抒情性才成了现代散文的根本特性，对情绪、感受和体验的表达才成了现代散文的根本要求。无视这一点，就不可能彻底地理解现代散文。

^① 这是陈平原先生2002年在由北大中文系和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中国散文论坛”上提出的观点。见林非主编《中国散文论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7页。

^② 贾平凹：《散文的九个问题》，见林非主编《中国散文论坛》，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79页。

我在本书再三申述的一个观点就是：现代散文的最终指向是对个人心魂的本真展呈，这一点是在写作者坚持“个人性”的前提下，与“抒情性”紧密地扭结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现代散文从本质上来说是感性的情感关注而不是理性的规训约束，是表达现代人的情绪、感受、体验，而不是观点、看法和意见的：

这一种文章形式的特征，在能掘取情绪的核心。不仅描绘情绪的波面，更有它深处的漩涡，不仅有浮光掠影，更有留下那光影的隐藏的纠结，不仅展开一幅画在读者眼前，更领导读者去分享画中丘壑的情绪，它有一股袭人的魔力牢牢牵引了读者，叫读者跟着他跑。^①

人们通常说“文如其人”，在我看来，散文是最能体现文如其人的一种文学体式。文学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一项精神劳动，在这种个人化的前提下，由现代人对自身“内宇宙”的强烈关注而带来的文体的“私密性”，在现代诗歌和现代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正如上文所说，20世纪初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个人主义观念在中国的肆张和高扬，使刚从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下解脱而出的中国人，在思想精神的层面进一步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从匍匐于宏大虚幻的“国”“家”神话转向了对“个我”的强烈关注。虽然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念在20世纪的中国屡遭误解和打压，它还是顽强地沉淀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基本的精神质素之一。正是在这种“个人主义”观念的支撑下，“个性”才得以产生和高扬，知识分子和作家才拥有了抵抗各种沾染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从而以一个傲然屹立的独立之姿进行思考和写作。这一点对于现代散文的写作者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

^① 丁谛：《重振散文》，见《笔谈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例如茅盾) 的散文作品所表达的大都不是一个秉持着精神自由和保持着独立之姿的作家的独异于他人心魂之音，这就决定了这些散文的文学品格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侵蚀，从而迅速失去读者。这对作者来说，未必是一种遗憾，而对后人，却不免要发出那轻轻的一声叹息。